

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

范红丽 杨嘉乐 张晓慧

摘要：本文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2012—2018 年 4 轮追踪调查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发现，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会文化组织的存在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幸福感，不同类型的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此外，农村社会文化组织数量的增加也会促进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村社会文化组织对女性、中年人和老年人以及居住在富裕村庄的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较弱。机制分析表明，农村社会文化组织能够通过营造和谐的村庄氛围和家庭氛围、促进农村居民身心健康来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

关键词：社会文化组织 公共文化服务 幸福感 农村居民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精神文化需求也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其公共需求结构逐步由生存性需求转变为发展性需求和享受性需求。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应该关注农村居民需求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实现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均衡发展。党的十九大将农村文化建设提升到乡村振兴这一国家战略高度。在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文化建设做出进一步部署，提出要“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这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公共文化服务是以公共文化空间为载体，以满足居民基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村失能老人家庭照料的社会支持研究”（编号：19CSH073）、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健康老龄化背景下山东省老年家庭照料经济价值评估和补贴规模测算研究”（编号：ZR2021QG017）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耿达, 2019)。其中, 农村社会文化组织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提供者,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完善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提出, 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这充分肯定了社会文化组织作为基层文化服务的枢纽, 在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农村社会文化组织富含当地文化特色, 多是农村居民因地制宜、自发形成的具有内源式发展动力的组织模式。它是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 能够充分发挥农村居民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有助于增强社会关联, 发挥“软规则”的规范优势, 调动农村居民参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 促进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村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相协调, 共同推进乡村振兴(贺雪峰和全志辉, 2001; 颜玉凡和叶南客, 2017)。微观层面, 农村社会文化组织发展的核心价值在于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 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直接体现, 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目标。宏观层面, 农村社会文化组织通过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满足农村居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推动形成邻里和睦团结、干群关系融洽的良好风尚, 使农村社会更加和谐(李炳坤, 2005)。因此,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将农村居民公共需求结构转变纳入分析框架, 以农村居民幸福感为立足点, 探究农村社会文化组织发展的成效和影响, 显得尤为重要。对这一问题全面、准确的分析, 将为有效发挥农村社会文化组织的积极作用、促进农村文化建设、更好地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充分发挥文化育人和文化引领的作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从已有文献来看, 学者们集中讨论了公共服务包括公共文化服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其中, 一部分研究侧重于将公共服务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Chophel, 2012; 伍如昕, 2017; 许海平和傅国华, 2018), 或重点关注公共设施条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张应良和徐亚东, 2020); 另一部分研究则聚焦公共服务某一领域来考察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如考察公共教育投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殷金朋等, 2019)。以农村居民幸福感为研究对象分析公共文化服务影响的文献较少, 仅有倪志良等(2017)、曾鸣(2019)的研究涉及了公共财政文化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上述研究虽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公共文化服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但大多只关注公共财政文化支出包括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等“输入式”文化发展措施(吴红云, 2020)。这可能无法全面反映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资源的吸收和利用程度, 从而不能全面揭示公共文化服务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农村社会文化组织作为以农村居民为主体成员的社会团体, 是开展文化宣传与教育、组织群众性文化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吴结兵和沈台风, 2015)。以社会文化组织为切入点展开研究, 能够更加准确地刻画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利用水平和接受程度, 全面考察社会文化组织的价值导向和行为引导功能(Wright and Andersson, 2013), 探析基层社区治理效能。鉴于此, 本文重点关注农村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并考察其影响的异质性和作用机制。

二、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说

（一）社会文化组织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幸福感作为一种主观感受，是个体基于客观事实状态，依据自己的评价标准对生活质量做出的主观价值判断。这个评价过程受到价值观念、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张学志和才国伟，2011）。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文化成为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能够满足居民的文化需求，在宣传教育、娱乐大众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从而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农村社会文化组织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于农村居民自身的文化需求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对于居民幸福感具有提升作用。一方面，农村居民参与社会文化组织可以丰富文化生活，拓展关系网络，增强社区和家庭凝聚力，提高生活质量，从而提升幸福感（伍如昕，2017）。另一方面，农村社会文化组织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创造了公共文化空间，营造了和谐的文化氛围，能够改善乡村的精神风貌和居民的生活环境，进而提升居民幸福感（颜玉凡和叶南客，2017；倪志良等，2017）。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1。

H1：社会文化组织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

从作用效果来看，社会文化组织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是有差异的。一方面，各地区的社会文化组织因其发展程度不同而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不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越高，社会文化组织的数量越多，居民幸福感越强（臧敦刚等，2016）。此外，不同类型的社会文化组织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教育文化组织等后物质主义组织对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卢凌宇和鲁小晔，2021）。另一方面，社会文化组织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也与个体的性别、年龄等内在条件及特征紧密相关，而且幸福感的体验和判断标准也具有主观性。公共服务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个体特征而异（许海平和傅国华，2018）。此外，中国地域广袤，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从各地区的村庄发展水平来看，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富裕村庄较多，可以提供更多专业化、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及服务，这更有利于提升当地居民幸福感（王家庭和梁栋，2021）。由此推断，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因村庄特征而异。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2。

H2：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社会文化组织数量和类型不同以及个体特征和村庄特征差异而存在差异。

（二）社会文化组织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

已有研究表明，社会文化组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从宏观环境层面来看，农村社会文化组织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功能是营造良好的公共文化空间和村庄文化氛围，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从而有效缓解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矛盾，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形塑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培育健康向上、团结友爱、积极进取的乡村精神风貌，促进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的形成（李树和陈刚，2012；聂应德和刘召燕，2021）。居住环境的改善与家庭

和谐氛围的营造有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申云和贾晋，2016）。由此可见，农村社会文化组织会通过改善村庄环境和促进家庭和谐，提升当地居民幸福感。

从微观个体层面考虑，农村社会文化组织引导和规范农村居民在文化建设中实现自我表现、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温铁军，2009），保障了农村居民的文化权力，提高了他们的归属感和成就感，这会促进个体身心健康发展。社会文化组织以喜闻乐见、贴近生活的方式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参与这些活动有助于农村居民强身健体，愉悦性情，进而对其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此外，农村社会文化组织为农村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如举办读书会、文艺培训班，可使农村居民增长见识，开阔视野，形塑和引导个体的主流价值观和认知行为。这有助于丰富农村居民的精神世界并促进个体身心健康（曾鸣，2019），提升其幸福感。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3。

H3: 社会文化组织通过改善村庄环境、促进家庭和谐与个体身心健康的机制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CLDS 于 2012 年、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实施了 4 轮追踪调查，覆盖全国 29 个省份的 400 多个村居（社区），是全国性的社会追踪调查。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针对 15 岁以上的劳动力展开调查，收集了丰富的个体人口学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村庄特征等多方面的信息。本文利用 2012—2018 年 4 轮追踪调查的面板数据，保留 18 岁以上农村地区样本，以检验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

本文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幸福感为离散变量，因此，本文构建 Logit 模型考察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P(Happiness_i = 1 | X_i) = \exp(Z) / [1 + \exp(Z)] \quad (1)$$

$$Z = \alpha_0 + \alpha_1 Culture_i + \alpha_2 X_i + \delta_i \quad (2)$$

(1) ~ (2) 式中，被解释变量 $Happiness_i$ 表示农村居民幸福感，核心解释变量 $Culture_i$ 表示当地是否有社会文化组织， X_i 为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等控制变量。社会文化组织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回归分析可能因内生性问题无法得到一致估计。内生性可能源于两个方面。其一，双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尽管农村社会文化组织的存在具有较强的外生性，但考虑到农村社会文化组织的发展也具有自发性的特征，可能导致社会文化组织发展水平与当地居民幸福感相互影响。比如，幸福感较强的居民更有可能自发成立社会文化组织，从而导致二者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处理这一内生性问题的有效方法是寻找与农村社会文化组织有关的工具变量。其二，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一种可能是遗漏了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变量，这可以通过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来解决。另外一种可能是遗漏了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变量，如个体性格偏好、能力和生活态度等，从而导致内生性问

题。这也需要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来修正。因此，为了准确估计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文选择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来控制不随个体、时间和地区变化的因素，同时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来缓解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对模型修正如下：

$$P(Happiness_{it} = 1 | X_{it}) = \exp(Z) / [1 + \exp(Z)] \quad (3)$$

$$Culture_{it} = \beta_0 + \beta_1 IV_{it} + \beta_2 X_{it} + \mu_i + \lambda_t + \eta_c + \zeta_{it} \quad (4)$$

$$Z = \gamma_0 + \gamma_1 Culture'_{it} + \gamma_2 X_{it} + \mu_i + \lambda_t + \eta_c + \varepsilon_{it} \quad (5)$$

(3) 式中， $Happiness_{it}$ 表示个体 i 在 t 时期的幸福感。(4) 式中， $Culture_{it}$ 表示个体 i 所在村庄在 t 时期是否有社会文化组织， IV_{it} 为第一阶段回归的工具变量， X_{it} 为控制变量， μ_i 、 λ_t 和 η_c 分别为个体、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用以控制不随个体、时间和地区变化的因素。(5) 式中， $Culture'_{it}$ 为第一阶段回归求得的社会文化组织的预测值。

(三)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村居民幸福感。该变量的设定基于调查问卷中受访者对“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过得是否幸福？”这一问题的回答，问卷中有“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一般”“不幸福”“非常不幸福”五类选项。由于选择“非常幸福”和“非常不幸福”的受访者较少，本文将农村居民幸福感设定为二分类变量，若受访者回答“不幸福”或“非常不幸福”，则该变量取值为 0，否则取值为 1。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社会文化组织。CLDS 调查了受访者所在村庄是否有民间成立的、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社会文化组织，具体包括知识学习类、技能传授类、娱乐艺术类和体育锻炼类这四类社会文化组织。尽管社会文化组织的存在情况并不能完全反映当地居民的参与情况，但农村社会文化组织作为“农有、农享、农治”的民间文化组织，其参与主体是农村居民。因此，该指标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衡量农村居民参与社会文化组织的状况。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社会文化组织设定为虚拟变量，若受访者所在村庄至少存在 1 个上述四类社会文化组织，则该变量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本文还考察了社会文化组织数量和不同类型的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其中，社会文化组织数量是该村存在的上述四类社会文化组织数量的总和，社会文化组织的类型按照知识学习类、技能传授类、娱乐艺术类和体育锻炼类来划分。

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上，本文参照韩峰和李玉双（2019）、周京奎等（2019）的做法，在保障样本量充足的情况下选择滞后一期的社会文化组织作为当期社会文化组织的工具变量。这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从与可能的内生变量的相关性来看，社会文化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具有一定的累积性，当期社会文化组织存在与否与上期社会文化组织存在与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此外，上期社会文化组织的存在情况作为历史数据难以影响农村居民当期幸福感，也不会受农村居民当期幸福感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社会文化组织作为工具变量，该变量既与当期社会文化组织相关又相对外生，满足工具变量的基本要求。

本文还控制了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其中，个体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党员身份、健康状况和社会保障享有情况。本文将婚姻状况分为未婚、

已婚、离异或丧偶这三类。受教育程度包括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学及以上这四类。健康状况用过去两周内是否有伤病来测度，若无伤病即健康状况良好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社会保障享有情况包括农村居民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家庭特征主要考察了孩子数量、是否拥有自有住房、家庭年收入情况。村庄特征主要考察了村庄基础设施情况和村庄宗族氛围。其中，村庄基础设施情况包括村庄是否有路灯和村庄是否硬化路面（彭代彦和赖谦进，2008）。本文采用村庄范围内是否有宗祠来测度村庄宗族氛围，若该村庄有宗祠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表1中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受访的农村居民中，居住的村庄有社会文化组织的比例约为55.7%。居住在有社会文化组织村庄的居民年龄偏小，受教育程度较高，党员占比较高，村庄基础设施更完善。总的来说，有社会文化组织的村庄的居民幸福感更高。考虑到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等问题，本文采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来缓解内生性问题，以尽可能准确地估计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全样本		有社会文化组织		无社会文化组织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农村居民幸福感（幸福=1，否=0）	0.622	0.485	0.636	0.481	0.605***	0.489
社会文化组织（有=1，无=0）	0.557	0.497	1	0	0	0
社会文化组织数量（单位：个）	1.062	1.294	1.902	1.147	0	0
社会文化组织类型						
知识学习类社会文化组织（有=1，无=0）	0.074	0.262	0.126	0.331	0	0
技能传授类社会文化组织（有=1，无=0）	0.028	0.164	0.047	0.212	0	0
娱乐艺术类社会文化组织（有=1，无=0）	0.279	0.448	0.474	0.499	0	0
体育锻炼类社会文化组织（有=1，无=0）	0.132	0.338	0.224	0.417	0	0
年龄（单位：岁）	46.864	13.713	45.859	13.716	48.128***	13.605
性别（男=1，女=0）	0.484	0.500	0.483	0.500	0.485	0.500
婚姻状况						
未婚（是=1，否=0）	0.087	0.282	0.089	0.285	0.084*	0.278
已婚（是=1，否=0）	0.875	0.331	0.873	0.333	0.878	0.328
离异或丧偶 ^a （是=1，否=0）	0.038	0.191	0.039	0.190	0.037	0.192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a （是=1，否=0）	0.519	0.500	0.508	0.500	0.534***	0.499
初中（是=1，否=0）	0.328	0.469	0.327	0.469	0.329	0.470
高中或中专（是=1，否=0）	0.112	0.316	0.122	0.327	0.100***	0.301
大学及以上（是=1，否=0）	0.041	0.197	0.043	0.204	0.037***	0.189
党员身份（是=1，否=0）	0.048	0.213	0.051	0.221	0.043***	0.204
健康状况（健康=1，不健康=0）	0.872	0.334	0.862	0.345	0.885***	0.320
基本医疗保险（有=1，无=0）	0.904	0.295	0.901	0.299	0.907**	0.290
基本养老保险（有=1，无=0）	0.552	0.497	0.539	0.499	0.569***	0.495
孩子数量（单位：个）	1.749	0.760	1.740	0.756	1.760***	0.765

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自有住房（是=1，否=0）	0.905	0.294	0.893	0.309	0.920***	0.272
家庭年收入（单位：元）的对数	9.689	1.593	9.397	1.698	10.058***	1.365
村庄是否有路灯（是=1，否=0）	0.379	0.485	0.402	0.490	0.349***	0.477
村庄是否硬化路面（是=1，否=0）	0.973	0.161	0.977	0.150	0.968***	0.175
宗族氛围（有宗祠=1，否=0）	0.225	0.418	0.250	0.433	0.194***	0.396
样本量	45283		25237		20046	

注：①a 参照组，②***、**和*分别表示居住在有社会文化组织村庄和无社会文化组织村庄的两组农村居民样本量均值差异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四、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本文先对工具变量是否符合要求加以验证。为了验证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条件和排他性约束，本文借鉴郑志丹和郑研辉（2017）、骆永民等（2020）的处理方法，先对（1）式回归求出残差，然后将滞后一期的社会文化组织（工具变量）对（1）式回归得到的残差进行回归，观察工具变量是否显著以判断工具变量与残差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由表 2 回归 1 的估计结果可知，滞后一期的社会文化组织的回归系数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表明，工具变量与残差不相关，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同时，表 2 回归 2 第一阶段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社会文化组织与其当期值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这验证了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在此基础上，表 2 回归 2 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显示，社会文化组织确实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农村居民感到幸福的概率显著提升了 4.8%）。这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说 H1，即乡风文明建设中社会文化组织的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

从控制变量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估计结果来看，年龄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呈正 U 型特征。与离异或丧偶的农村居民相比，已婚的农村居民幸福感更高。拥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幸福感较高。健康状况良好的农村居民幸福感更高。此外，享有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均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家庭特征方面，家庭年收入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收入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村庄特征方面，村庄基础设施越好，农村居民幸福感越高。

表 2 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总体影响

变量	残差 回归 1		农村居民幸福感 回归 2			
	回归系数	标准误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社会文化组织					0.048***	0.011
年龄	-0.010	0.008	0.010***	0.004	-0.017***	0.004
年龄的平方	0.016	0.011	-0.012***	0.002	0.020***	0.003
未婚	-0.083	0.081	0.020	0.017	0.031	0.030

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已婚	-0.047	0.064	0.063***	0.012	0.010***	0.002
初中	0.003	0.017	0.062	0.040	0.028***	0.009
高中或中专	-0.004	0.003	0.082	0.067	0.057***	0.015
大学及以上	0.057	0.075	0.057***	0.015	0.012***	0.003
党员身份	0.011	0.057	0.062***	0.011	0.093***	0.020
健康状况	0.004	0.012	0.071***	0.016	0.012***	0.004
基本医疗保险	-0.001	0.016	0.017**	0.008	0.024**	0.012
基本养老保险	-0.001	0.010	0.016***	0.005	0.027***	0.008
孩子数量	0.009	0.012	0.004	0.045	0.001	0.007
自有住房	0.004	0.009	-0.099	0.093	-0.021	0.017
家庭年收入的対数	0.006*	0.004	0.019***	0.002	0.031***	0.004
村庄是否有路灯	0.004	0.015	0.026***	0.007	0.044***	0.013
村庄是否硬化路面	-0.011	0.013	0.025	0.018	0.032	0.033
宗族氛围	0.056	0.087	-0.011	0.011	0.091	0.087
滞后一期的社会文化组织	0.030	0.028	0.090***	0.032		
固定效应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Hausman检验	1047.86***		703.54***		89.34***	
DWH检验					479.63***	
样本量	38542		38542		38542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二) 社会文化组织发展程度与社会文化组织多样性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过程中，增加公共文化服务的数量和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类型可谓塑造良好文化环境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检验了村庄社会文化组织发展程度和多样性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首先，本文考察了社会文化组织发展程度（以社会文化组织数量来衡量）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表 3 回归 1 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村居民所在村庄的社会文化组织数量越多，其幸福感越高。这表明，乡风文明建设程度越高，为农村居民提供的文化资源就越丰富，可更好地满足农村居民求知、娱乐、审美等精神文化需求，从而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该研究结论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说 H2 中提出的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社会文化组织数量而异，社会文化组织数量越多，农村居民幸福感越强。

其次，本文考察了社会文化组织多样性（以不同类型的社会文化组织来衡量）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探究不同类型的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差异性，有助于为合理分配资源发展不同类型的社会文化组织提供参考。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分析了知识学习类、技能传授类、娱乐艺术类和体育锻炼类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表 3 回归 2 至回归 5 的估计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农村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确实存在差异。其中，农村地区较为常见的娱乐艺术类社会文化组织丰富了农村居民的文化、娱乐和休闲生活，使得农村居民感到幸福的概率显著提升了 8.5%。技能传授类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也较为明显，使得农村居民感到幸

福的概率显著提升了 8.0%。这可能是因为该类社会团体通过组织开展培训等活动能够增加农村居民的就业技能和知识储备,进而提升其就业优势和收入水平,对于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较大的提升作用(卢海阳等,2017)。此外,知识学习类社会文化组织和体育锻炼类社会文化组织使得农村居民感到幸福的概率显著提升了 3.8%和 1.9%。该研究结论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说 H2 中提出的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社会文化组织类型而异。

表 3 社会文化组织发展程度与社会文化组织多样性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变量	农村居民幸福感				
	社会文化组织发展程度	社会文化组织多样性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回归 5
社会文化组织数量	0.062** (0.028)				
知识学习类社会文化组织		0.038*** (0.011)			
技能传授类社会文化组织			0.080** (0.036)		
娱乐艺术类社会文化组织				0.085*** (0.018)	
体育锻炼类社会文化组织					0.019*** (0.00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固定效应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F 检验	23.53***	27.83***	31.45***	29.64***	20.88***
DWH 检验	575.06***	429.76***	431.71***	108.30***	167.79***
样本量	38542	38542	38542	38542	38542

注:①表中回归系数为边际效应估计结果,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②***、**分别表示在 1%、5%的水平上显著。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通过变换回归模型和替换农村居民幸福感衡量指标来进行稳健性检验^①。首先,考虑到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幸福感是基于受访者对“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过得是否幸福?”这一问题的回答来设定的,问卷中有“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一般”“不幸福”“非常不幸福”五类选项。本文按照这五类选项将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幸福感设定为五分类变量,构建有序 Probit 模型来分析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采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回归得到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表明,居住的村庄有社会文化组织的农村居民选择“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一般”的概率较低,选择“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较高。具体来说,社会文化组织的存在使得农村居民选择“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下降了 5.2%、2.9%

^①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读者如有需要请联系笔者索取。

和 6.0%，而选择“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了 2.4%和 4.8%。这表明，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促进作用，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其次，生活满意度也是衡量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指标，该指标呈现了受访的农村居民对当前生活的评价，能够反映受访者对其生活状态的真实态度（鲁元平和王韬，2011）。因此，本文采用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指标来进行稳健性检验。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是基于受访者对“总体来说，您对您的生活状况感到满意么？”这一问题的回答来设定的，问卷中有“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五类选项。若受访者回答“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则该变量取值为 0，否则取值为 1。本文采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对 Logit 模型回归得到边际效应估计结果。上述估计结果表明，社会文化组织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农村居民对生活感到满意的概率提升了 5.7%），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五、进一步研究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文化组织会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但社会文化组织的影响在不同群体间是否存在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经济发展不均衡和政策不同步也可能导致公共服务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谢舜等，2012；罗万纯，2014）。因此，本文继续考察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并进一步分析社会文化组织究竟通过哪些作用机制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

（一）异质性分析

本文按照个体特征和村庄特征，依据农村居民年龄、性别和村庄富裕程度、村庄所在地区设定分类变量，引入各分类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社会文化组织的交互项，采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分析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

首先，本文按照性别设定二分类变量，并基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划分标准，设定农村居民年龄组的三分类变量，分为 45 岁以下的青年人、45~60 岁的中年人和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三类，在回归模型中分别纳入社会文化组织与性别以及社会文化组织与不同年龄组的交互项，考察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因个体特征而异。表 4 回归 1 和回归 2 报告了采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回归得到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该估计结果表明，社会文化组织对女性、中年人和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对社会文化组织的接受程度更高，中年人和老年人对社会文化组织的参与程度也更高，这三类群体通过积极参与社会文化组织享受到更多的公共文化服务，进而在更大程度上提升了幸福感（Ye et al., 2015）。

其次，本文基于 CLDS 的村居调查问卷中对村集体财政收入的调查，以村集体财政收入的均值为标准，将村集体财政收入大于样本均值 35 万元的村庄定义为富裕村庄，如果农村居民居住在富裕村庄，则该变量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万海远等，2015；张靖娜和陈前恒，2019）。本文还将农村居民所在村庄按照地区划分为东部地区村庄、中部地区村庄和西部地区村庄。表 4 回归 3 和回归 4 的估计结果显示，社会文化组织对居住在富裕村庄的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更大。这或可归因于富裕

村庄资金更为充足，能够为本地居民提供更为丰富和全面的公共文化服务。而且，富裕村庄的居民整体收入水平较高，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也更强，社会文化组织可在更大程度上提升当地居民幸福感。分析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地区异质性也可发现，相比于东部地区，社会文化组织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较弱。主要原因可能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存在差距，西部地区社会文化组织还不够发达，在满足农村居民精神需求方面的效能还有待提升。本文异质性分析结论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说 H2 中提出的，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个体特征和村庄特征差异而存在差异。

表 4 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农村居民幸福感			
	个体特征		村庄特征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社会文化组织	0.032*** (0.009)	0.033** (0.014)	0.041*** (0.012)	0.053** (0.025)
社会文化组织×男性	-0.075*** (0.026)			
社会文化组织×中年人		0.040** (0.020)		
社会文化组织×老年人		0.012** (0.005)		
社会文化组织×富裕村庄			0.053** (0.026)	
社会文化组织×中部地区村庄				-0.016 (0.014)
社会文化组织×西部地区村庄				-0.055** (0.02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固定效应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样本量	38542	38542	38542	38542

注：①回归 2 中的控制变量不包含年龄和年龄的平方；②表中回归系数为边际效应估计结果，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③***、**分别表示在 1%、5%的水平上显著。

（二）机制分析

如前文所述，社会文化组织有助于良好的公共文化空间和村庄文化氛围的形成，可通过改善村庄环境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此外，社会文化组织还对家庭和谐与个体身心健康具有积极作用，进而对农村居民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本文从村庄、家庭和个体特征三个方面，选取村庄乡风文明、家庭和谐程度与个体身心健康这三个中介变量，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社会文化组织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其中，村庄乡风文明的变量设定基于 CLDS 的村居调查问卷中对居民人际关系的评价

价,若当地居民之间关系融洽,则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家庭和谐程度的变量设定基于CLDS的劳动力个体调查问卷中对受访者家庭关系和谐程度的调查,若受访者的家庭关系和谐程度比较高或者非常高,则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个体身心健康的变量设定基于CLDS的劳动力个体调查问卷中对受访者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调查,若受访者认为自己身体健康(受访者对于“您认为自己现在的健康状况如何?”的回答若选择“非常健康”“健康”“一般”这三个选项之一,即界定受访者认为自己身体健康),且在过去一个月内也没有出现或很少出现情绪问题,即表明受访者身心健康状况较好,则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由表5回归1和回归2的估计结果可知,社会文化组织确实会促进乡风文明,进而对农村居民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表5回归3和回归4、回归5和回归6的估计结果表明,社会文化组织既提高了家庭和谐程度,也有助于促进个体身心健康,进而提升了农村居民幸福感。概言之,社会文化组织确实能够发挥价值导向和行为引导功能,有助于形成和谐的村庄氛围和家庭氛围,并对个体身心健康具有积极作用,进而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该研究结论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说H3。

表5 社会文化组织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分析

变量	村庄乡风文明 回归1	农村居民幸福感 回归2	家庭和谐程度 回归3	农村居民幸福感 回归4	个体身心健康 回归5	农村居民幸福感 回归6
社会文化组织	0.079*** (0.020)	0.025** (0.012)	0.039*** (0.011)	0.034 (0.043)	0.068*** (0.017)	0.029 (0.021)
村庄乡风文明		0.027*** (0.009)				
家庭和谐程度				0.015*** (0.005)		
个体身心健康						0.027*** (0.00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固定效应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样本量	38542	38542	38542	38542	38542	38542

注:①回归5和回归6中的控制变量不包含健康状况;②表中回归系数为边际效应估计结果,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③***、**分别表示在1%、5%的水平上显著。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2—2018年4轮追踪调查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深入探讨了社会文化组织发展程度与社会文化组织多样性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和机制分析。本文发现:第一,农村社会文化组织的存在会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而且农村社会文化组织数量的增加也会促进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第二,不同类型的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娱乐艺术

类和技能传授类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较大。第三，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从个体特征角度来看，社会文化组织对女性、中年人和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从村庄特征角度来看，社会文化组织对居住在富裕村庄的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更大程度的正向影响，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较弱。第四，机制分析表明，农村社会文化组织能够通过营造和谐的村庄氛围和家庭氛围、促进农村居民身心健康来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无法分析农村居民参与社会文化组织的状态对其幸福感的影响，这将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

本文结论的启示在于，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文化组织有助于和谐村庄氛围和家庭氛围的形成，有利于农村居民身心健康，进而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发展农村社会文化组织能够进一步激发乡村振兴主体的内生动力，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水平。各级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农村社会文化组织的软实力，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中，鼓励农村居民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以更好地满足农村居民的精神需求，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从操作层面来看，一方面，要解决目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内容陈旧、形式单一的问题，在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的基础上进一步统筹规划发展不同类型的农村社会文化组织。在支持娱乐艺术类和体育锻炼类社会文化组织发展的同时，更要鼓励和引导技能传授类和知识学习类社会文化组织的成立和发展，为农村居民提供更为实用、便捷的学习、培训平台，让农村居民从中受益。另一方面，要注意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群体间的异质性。在增进中年和老年群体幸福感的同时，重视提高社会文化组织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鼓励青年群体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此外，也要重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均衡发展，推动贫困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农村社会文化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乡风文明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步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 1.耿达，2019：《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基于扎根理论的云南和顺图书馆的案例研究》，《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第53-70页。
- 2.韩峰、李玉双，2019：《产业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规模扩张》，《经济研究》第11期，第149-164页。
- 3.贺雪峰、仝志辉，2001：《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第124-134页、第207页。
- 4.李炳坤，2005：《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农村经济》第11期，第4-9页。
- 5.李树、陈刚，2012：《“关系”能否带来幸福？——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中国农村经济》第8期，第66-78页。
- 6.卢海阳、杨龙、李宝值，2017：《就业质量、社会认知与农民工幸福感》，《中国农村观察》第3期，第57-71页。
- 7.卢凌宇、鲁小晔，2021：《社会组织类型与主观幸福感》，载赵剑治（编）《多学科视角下的国际发展合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3-177页。
- 8.鲁元平、王韬，2011：《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经济学（季刊）》第4期，第1437-1458页。

- 9.罗万纯, 2014: 《中国农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供给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农户视角》, 《中国农村经济》第11期, 第65-72页。
- 10.骆永民、骆熙、汪卢俊, 2020: 《农村基础设施、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与非农就业》, 《管理世界》第12期, 第91-121页。
- 11.倪志良、成前、王鸿儒, 2017: 《财政文化支出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2013调查数据的分析》,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第7期, 第1-13页。
- 12.聂应德、刘召燕, 2021: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路径探析》,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第79-83页。
- 13.彭代彦、赖谦进, 2008: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福利影响》, 《管理世界》第3期, 第175-176页。
- 14.申云、贾晋, 2016: 《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经验研究》, 《公共管理学报》第3期, 第100-110页、第158页。
- 15.万海远、田志磊、徐琰超, 2015: 《中国农村财政与村庄收入分配》, 《管理世界》第11期, 第95-105页。
- 16.王家庭、梁栋, 2021: 《文化产业发展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0期, 第35-46页。
- 17.温铁军, 2009: 《“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第88页。
- 18.吴红云, 2020: 《当前我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影响因素及对策简析》, 《农村经济与科技》第1期, 第267-269页。
- 19.吴结兵、沈台凤, 2015: 《社会组织促进居民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研究》, 《管理世界》第8期, 第58-66页。
- 20.伍如昕, 2017: 《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56个城市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人口与发展》第3期, 第37-48页、第67页。
- 21.谢舜、魏万青、周少君, 2012: 《宏观税负、公共支出结构与个人主观幸福感——兼论“政府转型”》, 《社会》第6期, 第86-107页。
- 22.许海平、傅国华, 2018: 《公共服务与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第1期, 第3-12页。
- 23.颜玉凡、叶南客, 2017: 《改善居民文化生活质量的资源依赖与组织认同——公共文化服务组织的行动逻辑研究》, 《山东社会科学》第2期, 第115-122页。
- 24.殷金朋、陈永立、倪志良, 2019: 《公共教育投入、社会阶层与居民幸福感——来自微观混合横截面数据的经验证据》, 《南开经济研究》第2期, 第147-167页。
- 25.臧敦刚、余爽、李后建, 2016: 《公共服务、村庄民主与幸福感——基于民族地区757个行政村31615个农户的调查》, 《农业经济问题》第3期, 第79-87页、第111-112页。
- 26.曾鸣, 2019: 《公共文化支出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了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第3期, 第26-36页。
- 27.张靖娜、陈前恒, 2019: 《草根组织发育与农民幸福感》, 《南方经济》第11期, 第103-119页。
- 28.张学志、才国伟, 2011: 《收入、价值观与居民幸福感——来自广东成人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管理世界》第9期, 第63-73页。
- 29.张应良、徐亚东, 2020: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主观幸福感》,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第1期, 第98-108页。

30.郑志丹、郑研辉, 2017: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身体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代际经济支持内生性视角的再检验》, 《人口与经济》第4期, 第63-76页。

31.周京奎、王贵东、黄征学, 2019: 《生产率进步影响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吗?——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 《经济研究》第1期, 第100-115页。

32.Chophel, S., 2012, "Culture, Public Policy and Happiness", *Journal of Bhutan Studies*, 26: 82-99.

33.Wright, G., and K. Andersson, 2013,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Rural Communities and Fores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mmunity-NGO Interactions", *Small-scale Forestry*, 12(1): 33-50.

34.Ye, D., Y. Ng, and Y. Lian, 2015, "Culture and Happines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23(2): 519-547.

(作者单位: 山东财经大学保险学院)

(责任编辑: 王 藻)

The Impact of Social Cultural Organizations on Rural Residents' Happiness: An Analysis Based on Data Analysis from CLDS Survey

FAN Hongli YANG Jiale ZHANG Xiaohui

Abstract: Based on panel data of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from 2012 to 2018,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fixed effect-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to verify the impact of social cultural organizations on th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The study finds that,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rural social cultural organizations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with various effects based on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types. In addition,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ocial cultural organizations in rural areas will also promote th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rural social cultural organizations contribute more significantly to the well-being of rural women,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as well as rural residents living in affluent villages, and less significantly to th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in the western region.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rural social cultural organizations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by creating a harmonious village atmosphere and family atmosphere and improving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rural residents.

Keywords: Social Cultural Organizatio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Happiness; Rural Resident